



三年五載

叶 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三年五载

上

叶 辛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珍元
封面、插图 廖志惠

三年五载

上

叶 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75印张 320千字 插页11

印数1—2,4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555 定价: 3.45 元



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

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
为补偿的。

——弗·恩格斯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三十四岁的青年作家叶辛，继《蹉跎岁月》之后，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，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，以浓郁的乡土气息，简捷而抒情的笔触，描绘了山乡农村、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，较深刻地反映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短短的三年五载中，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，揭示了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题材。

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形象鲜明，各具特色，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。如作者着力刻画的主人翁、勇敢的改革者景传耕，性格内涵，胸襟开阔，心中装的是广大农民的利益，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，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。他和女主角丁慧芸之间的爱情，历经久，坎坷多磨，屡屡生变，既扣人心弦，又令人揪心，充分展示了男女主人翁在爱情生活中，丰富、复杂、细腻的内心世界。女主角丁慧芸在爱情上，更是几起几伏，大起大落，写得很有光彩。她既是今天农村中，朴素、健美的先进妇女，又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。

小说中所描写的另外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，如全大良和费瑞娟、黄晓婷和盛雍、纪明洁和贡建湘，也都写得很有特色。尤其是寡妇华碧芳，在重新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所经历的辛酸和欢乐，读了令人怦然心动。

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生活中的爱情，而是把这些爱情放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并和社会的、时代的变迁，紧紧地联系起来写，因而颇有深度和新意。

小说先后在刊物上发表后，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。这次出版，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润饰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往事的阶梯

(代序)

往事如烟。

烟霭雾岚之中，还是能依稀看出那一级一级的阶梯。就好比雾涌峰浮的巍巍山岭间，砌起的供人攀登的石阶，曲曲折折，弯弯曲拐，时而通向岭巅，时而直落深谷。不论这石阶多么崎岖难行，不论这石阶盘山绕坡通向何处。人们照样一眼就能看出，这是崇山峻岭间的路。

人生的路不也是如此嘛。

常有热心的青年朋友们来信，询问我的经历，询问我所走过的路。遂以《往事的阶梯》为题，试作一简略的回答。要说明的是，我尚年轻，这只是一段短促的路而已。

十月，一九四九年。

随着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，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深处。那时的上海，真可说是五方杂处，百业纷陈，处于一个新旧交替时期。而我，只会张开嘴巴哇哇地放声大哭。

九月，一九五七年。

和很多满了七岁的孩子一起，我背着书包，走进了家对面的那所小学。这所小学的名字，是我至今为止认为最好的：中国小学。

八月，一九六一年。

暑假又来临了，还是象往年的暑假那样，打弹子、抓蝉、玩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、斗蟋蟀来消磨吗？不！我觉得不满足了，我想另外干些什么。

三年级时，《中国少年报》上连载了陶承同志的《我的一家》，老师每星期给我们念一节，我嫌等待的时间太长，自己掏零用钱买了一本，囫圇吞枣地读了一遍，读懂了一半。从此以后，我众多的喜好中又添了一件事：读有趣的书。这年暑假里，学校开展红领巾读书活动，每个班级分到好多书哟，个个同学都可以借，只要如期归还就成。

我借了一大迭书，到暑假结束的时候，书籍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我觉得其他的喜好在消失，而读书的欲望却与日俱增。

书籍给我打开了通向生活的门户。书本以它绚丽多姿的意境给我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动人的图画，给我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。

谁没经过少年时代，谁又没在少年时代做过那么多幻想的梦啊。我幻想着长大了去航海，战胜惊涛骇浪；我憧憬着未来去登山，越过雪山冰川；我认真地思考着，当了司令员之后，怎样象夏伯阳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打仗……有趣的荒诞的梦。但是，离我真正地爱上文学，还有一段距离。

记得，那是我读过《童年》之后，我沉浸在书本描绘的生活中，久久地不能平静，好象有什么东西，叩击着我的心扉一般。我暗自思忖着：那些发生在外国的事情，怎么我竟象看见过一模一样呢。我抚摸着书的封面，第一次想到写书的人，第一次感到写书的人是了不起的。看这个耸起额头的外国老头儿呀，他写出的书感动了我这个中国小孩子。我仔细端详着外国老头儿的相貌，突然象被火烫着似地跳了起来：我见过这个人，见过这个人的。在哪儿碰见这个人的呢，想了半天，总算想起来了。在上海市少年宫

的阅览室里，这个人的像画得好大，和鲁迅先生的像挂在一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想到，我长大了，也要当写书的人，也要去感动那些读我的书的小孩子。哦，一个多么美好却又难以达到的愿望。

六月，一九六六年。

红色风暴惊醒了我升高中的梦。我虔诚地、狂热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。看大字报、抄大字报、写大字报，把学校里、社会上看到、听到的一切，都记在一个小小的四四方方的本子上，随身携带着，那是我的日记。也是我对生活最初的思考。怎么办呢？传单、宣言、标语、口号充塞着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正在打派仗的学校里是进不去的。而离家很近的南京路在沸腾，上海在沸腾。面对着一派热闹得带点儿骇人的景象，我困惑地观望着，观望着，一点儿不知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投身于这场“革命”。

十二月。一九六八年。

严冬早早地来临了。虽然没有暖气，没有烤火，我依旧在读书。还是小学里的那个愿望，支撑着我的求知的信念。鬼知道书都是从哪儿借来的呀，两年多来，我读了那么多。世界文学名著，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地理、历史、诗歌……我是完全自由的，可以任意地支配时间。人们称我为逍遥派。而我的身旁，竟然会有这么多逍遥派，初中的、高中的、大学的学生，还有很多邻居，他们和他们的同学交换书籍，交换来以后，我就拿来读，读得很快，还随手写下一点笔记，特别喜欢的，我就抄，通宵达旦地抄。逍遥派的日子，其实并不逍遥。读书，每天午后去南京路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，听高音喇叭大声宣读“首都来电”，看大字报上的“××事件真相”。内心深处，一直在盼着分配、分配，怎么还老不分配到我们。这天夜里，二十一日夜里，毛主席发表了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：

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

照例，喧天的锣鼓响到半夜，保证书、决心书、请战书、致敬电雪片样飞起。我看到了自己要走的路，暗自思忖着：上山下乡，到广阔的天地去，我离文学之路是远了，还是近了？我不得而知。

四月。一九六九年。

贵州终于到了。修文县终于到了。

迎接我们的，是一场奇特的倒春雪。雪花飘呀飘呀，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，飘落在送我们去山寨的卡车上，飘落在连绵无尽的、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的大山的脊梁上。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，可冷啦！可我们的心，却都是热乎乎的。我们终于到达第二故乡啦！

我怀着青春的热情，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来了。我相信，我是能大有作为的。

首先，我要自食其力，自己养活自己。过好思想关、劳动关、生活关。然后，我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，重新安排修文的山山水水。

看嘛，壮丽的山川河谷，山乡的风土人情，和上海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，充满了乡土气息的民风民俗，带着浓郁韵味的贵州话。不跑到山寨来，我能知道这一切吗？我来对了，我是离文学之路近了，近了，我要写。

七月。一九七零年。

写，谈何容易啊。插队落户的知青屋里，放下四张床，就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了。到了晚上，没有电灯。再说，白天还得虚心接受再教育呀，劳动有多累人哪。挑粪、耙田、铲田埂、钻煤洞挖煤，在土砖窑上当小工、背灰、打煤巴……一天干下来，回到集体户，最好脚也别洗，倒在床上便睡。

这些，倒还在其次，我可以想办法克服。没有桌子，我掀起铺盖，以铺板当桌子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写。没有电灯，用墨水瓶

改制个小油灯，点起来同样照亮。劳动累人嘛，我挤一切空余时间练笔。清晨，搬条板凳，带块搓衣板，坐在后屋檐下，把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；夜里，伙伴们睡了，我以床铺当桌子，点起小油灯写。油灯摇曳的火焰，把我的帐子熏得漆黑。我妹妹曾给我洗过一次，后来，她不愿洗了，我更顾不上了。下雨天不出工，知青们聚在一块儿，抽烟、喝酒、发牢骚，打牌、吹牛、消磨时间，我找一个安静处去写。赶场天，别人往街上跑，我躲在屋里写。贵州山乡到了农闲时节，出工很晚，我就起大早，到山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。那儿只有破败的四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，非常安静。我可以一直写到妹妹招呼我，该下山吃饭了才歇笔。

所以说，条件差些还能对付；但写些什么呢？这就难办了。

下乡之后，我睁大了双眼四处观察，拼命地去找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。可我插队的山寨上太僻静了，静得连意外的事故也很少发生，比如说有人掉进水里，哪家的房屋起了火。假使出点这样的事故，多少还能写一写舍身救火的英雄，还可能出个把勇救孩子的先进人物。可是，唉，山寨上总是那么静、那么静……相反，在乡间生活得久了，严峻的生活现实拂去了我眼里看到的浪漫色彩，画山绣水固然美，但美不能饱肚子。山寨上的贫穷，使我惊骇：繁重的劳动，褴褛得不能蔽体的衣服，低得怕人的劳动日值，粗砺得难以下咽的包谷饭……写这些吗？我自小接受的教育提醒我：这些是不能写的，这都是“阴暗面”，是局部地区发生的事，是生活的支流。而文学，应该写出生活的本质和主流。

我该怎么办呢？是我自小接受的概念错了，还是生活在以它的表象欺骗着我。我陷入了不知所云的苦闷之中。

这才是我走上文学之路最大的难处。

很自然地，我开始了思索，面对严峻的现实开始了思索。这样的思索引导我更好地去感受生活，去认识祖国广袤大地上，常

年累月辛勤耕作的农民，去深刻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。多少年以后，我才意识到，这种严肃的思考对我有多么重要。

十一月。一九七一年。

由狂热、虔诚陷入彷徨、颓丧。这是我最感压抑和迷惘的一段时期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在徘徊和苦苦地思考的时期。

九·一三事件的爆发，消息陆陆续续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遥远的山寨，传到我已当了一年多民兵的湘黔铁路工地——苗岭腹地的深山沟里，最后终于得到了证实。这一证实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震惊不已，感慨、议论、争执、猜测、惊呼上当，不须组织的闲聊和深谈，常常可以从晚饭后直讲到下半夜。

震惊之余，我进入了进一步的思考。思考的结果，我觉得我需要振作，需要脚踏实地的，从脚下的崎岖小道上，迈开我生活的脚步。我还得写。

这时候学习写作，比前一年更困难了。因为我是在铁路工地上。

湘黔铁路工地的生活，最初是“天当铺盖地当床”，男同志每人发一根棍子和一张芦席过夜；后来住进了工棚，由每人八寸宽的铺位增加到一尺八寸，固定下来。终年累月的吃老南瓜汤，碱水煮巴山豆。想着写东西，想着搜集点素材，我没闲心去弄吃的，找住的，每天上班前、下班后带着一个小本子，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，房屋结构，去问当地的苗家，鱼为啥养在稻田里，坡上的树都叫些什么名儿，林子里有些什么鸟，婚丧嫁娶时为啥非要按一定的程序办，当地流传着那些民歌，上山对歌时男女青年之间唱的是些啥内容，解放前的山岭河谷是这个样吗，有没有土匪，商人们怎样进这一带山岭里来……问完了，回到工棚里，我倒头便睡。第二天一早，不待人家起床，我又爬上山头，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山谷里袅袅升起，去听雀儿怎样开始清晨的啼鸣，去望苗家姑娘们蹒跚地挑着担上坡，去观察苗家寨上怎

么开始一天的生活……山野、树林、河谷、楠竹丛，大自然的一切，使得我的心静，使得我能更好地感受和思索。是的，那年头没有创作学习班，没有刊物，身旁也找不到一个老作家对我辅导，连爱好文学的知青也很少。即使有，不一定谈得拢。不过，生活已经告诉了我，我经历的一切，对我会是有用的，我随身带的小本子上，记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：人们的对话，吵架时骂的污言秽语，老年人口中的谚语，接触某人某事的零星感受，思考的点点收获，我都随时记下来。我还试着给周围一些熟悉的人写小传，这件事后来启发我在写作长篇小说时搞人物分析。同一种人物见多了，同一现象看多了，我以后写他们时，脑子里就不空了。

我在羊肠小道上跋涉着，艰难地跋涉着。为我的这些努力和追求，我开始付出代价，牙齿在连年的剧痛后一颗一颗地脱落，一遇天阴雨落，膝关节就隐隐作痛。那当然都是这段生活给我留下的纪念和烙印。

五月。一九七三年。

退稿。一厚迭，四十万字的小说稿，外面包扎的牛皮纸已经撕开了，这在乡间的邮电所里是常事。这就是说，好些人都晓得了，我在写小说。伴随着退稿，流言蜚语也传开了，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“这是走白专道路，妄想出人头地”。

啊，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呀，你们说过也许就忘了，你们还是睡得那么沉。可你们是否晓得，这一迭稿子里，有着我的追求，有着我的心血啊。捧着退稿，我失望得掉了泪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不过，我还是默默地忍受下来了。我决不想去反驳任何人的风言风语，我也不对任何人提起我的挫折，我要面子，我有自尊心啊！我牢记着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这句人人皆知的格言，就是在收到退稿那天，我照样铺开稿纸，继续写。我要把挫折当成是成功的阶梯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要从失败中迈开步子去。

我自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，我更晓得外地人学当地话味道总不对，我也明看到生活条件的艰苦，创作条件几乎是没的。我插队的寨子工值低呀，一年干到头，扣除口粮款，没几块钱可进。我得精打细算省下钱来买煤油，我得指望上海那些好心的老同学给我寄稿纸。但我一定要干下去。

在附近大队一个集体户里，因为有的知青说了嘲笑我的话，大家争执起来，险些打架。事后我听说了，对我的好朋友说，谁不说几句闲话呢。让他们说我好了，说得越多越好。不是我今天来打“马后炮”，当时我确是那么讲的。真要谢谢那些说风凉话的同志，当时要没那么多人说，也许我的劲头还没那么大呢。真的。

十月。一九七五年。

我过了二十五岁的生日。

二十五岁意味着什么呢？对一个插队知青来说，意味着招收学徒工，人家不收了。抽调时，排斥在外了。当大学生，嫌大了。

但是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不断地感受生活，不断地写，伴随着我一天一天走过来了。我呢，竟然也一天一天逐渐地找到了表达的方式。

有谁知道，为找到这种表达方式，我曾放弃过进工厂、进学校的机会呢。有谁知道，为取得这点进步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闭塞的山寨上，多待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呢。啊，生活是公平的，这几百个日日夜夜，毕竟没有白白地虚度。她给了我多少书本上和浮泛的日子里所得不到的东西呀。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，我思考了半个世纪来我国农民的命运，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写。《三年五载》，也是因为在那段岁月里有了较多的感受，后来又接触到变化了的农村、才写出来的。

但在我找到一点表达方式的时候，出版社要借我去改稿子，

电影厂要借我去改电影。有人站出来了，振振有词地不准我去修改稿子，说是：要改，在农村改嘛！柏油马路上栽不出万年松。一个知识青年，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了那么多年，不能脱离生活，不能住进高楼深院，不能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。

说得多么动听，偏偏他一天也没到生活里来过。

受到这样的压力时，我的心情是抑郁的，情绪是烦躁、低落的，甚至是忿怒的。可是我仍坚信，挫折不能迫使我停笔，我非要写下去不可。电影文学剧本《火娃》的草稿，就是我憋足了一口气，花三天时间写出来的。

幸好我们生活中的好人总是多于无赖。我碰到了那么多关心我、支持我、帮助我的老同志、老编辑，要开起名单来，长长的一串，简直是难以数周到的。当然罗，出版社、电影学院的领导没理会这些话，仅仅只停顿了没有多久，我又继续改稿了。

春天。一九七七年的春天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的第一个春天。

北京火车站。我站在月台上，焦急地等待着由上海驶来的火车。

我的责任编辑，托他的一个亲戚，把刚刚印出来的我的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，随身带到北京来，让我在车站接。

“咔嚓咔嚓”，车轮切着铁轨，上海到北京的列车进站了，停靠在我身前。我的心“怦咚怦咚”直跳，竟然会没看到车窗口伸出来五个大字：《高高的苗岭》。那是写来让我辨认的。

当我接过那包书时，我的手在颤抖，这是我的头一本书，只有我知道，它对我是多么地珍贵。第一版，这本书印行了二十万册；第二版，又印行了十七万册。书出版了不久，很快地翻译成了盲文、朝鲜文，改编成了连环画，并由我和谢飞同志一起，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，拍摄成电影《火娃》公映了。无须说明，这本处女作是幼稚的。

二月。一九八二年。

一场漫天大雪，把地处西南的省城贵阳，全笼罩在偌大的雪被里。

屋里没生火，好冷啊！这是二戈寨的一幢楼房，我姐姐新搬的家。我趁午后的时间，在里屋写一篇《后记》。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的单行本，已经印出初校样了，关心我的出版社领导，让我写一篇谈三部知识青年长篇的文章。我写着：

“……从69年去插队落户，到79年10月领上第一份工资，可以说，我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生活道路。就在这么一条生活道路上，我思索着、劳动着、追求着、体验着，试着把我感受到的、经历过的、想到的一切写下来。

“是的，这一切和整个世界、整个人类的命运比较起来，是太微不足道了。但这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不想轻易把它抛弃，我要把它写出来。”

四月。一九八三年。

快到“五一”节了，我抱病在黔灵山下的一间屋子里写作本书的中卷《拔河》。约九点四十分，有人敲门，我打开门，走进两位新华社记者，他们含笑告诉我，在刚刚宣告选举结果的省人大会上，我被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。闪光灯一亮，记者同志为我摄下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。

当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难寝，我想着，该怎样勤奋地工作，不断地努力，为祖国、为人民尽可能多地贡献我的一份微薄的力量。我想着逝去了的岁月，更多地想着未来……

踏着往事的阶梯，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。

卷 一

基 石